

## 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

夏曉虹\*

毫無疑問，秋瑾為晚清女界的先覺者。但這並非意味著其思想的自發與自足，恰恰相反，秋瑾的言行清晰地映現出時代思潮的演進脈絡。由於秋瑾的敏感與激烈，使她能夠得風氣之先，成為最新學說的接受者，從而如同測試與顯示晚清思想界風雲變化的一座晴雨表。

追蹤秋瑾女性獨立意識的萌生，一九〇二年前後北北京城實為一大契機。居湘時期的秋瑾，也會對丈夫王子芳及其家庭有所不滿，但其婚姻理想，距舊式小說、戲曲中讚美的「才子佳人」型並不遙遠。一八九七年，其妹秋理出嫁，秋瑾賦詞祝賀。這一闕〈賀新郎〉雖以「戲賀佩妹合卺」為題，似存遊戲之意，而其中「藍橋玉杵緣圓足，人爭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卻還是反映出秋瑾的真實心跡。才子佳人的結合，較之以金錢、權勢聯姻固然已勝一籌，然而，其仍然置根於男子中心的社會結構與思想體系，故於女性更強調的是美貌而非才學。在此階段，秋瑾因閉錮於家庭，未能更多接觸新風氣，從其詩詞所用語匯不脫舊範圍可見一斑。因此，推至極致，其詩中流露的對建立赫赫戰功的古代女將軍的仰慕，以及「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幗易兜鍪」<sup>①</sup>的自嘆，也僅指示出秋瑾人生理想與現實處境的懸隔，選擇的典範仍指向傳統，而並非對爭取男女平權的現代意識有所領悟。

旅京以後，秋瑾的思想風貌迅速改觀。其時，北京儘管在清王朝的直接控制下，不及上海華洋雜處，對西方思潮採更開放的態勢，但新學也已相當流行。秋瑾本以才學自負，又懷有高遠的理想，一旦躋身新環境，讀到各種新書新報，結識眾多新學之士，自然如魚得水，原先潛藏的能量勃然爆發，轉化為趨新的巨大動力，

---

\*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① 秋瑾：〈杞人憂〉，《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在京師學界很快脫穎而出。

據徐珂《清稗類鈔》記述：「光緒壬寅，秋瑾初至京師，寓南橫街圓通觀斜對一小宅，終日蟄居，非其所親，見之輒斂避。」<sup>②</sup>這種描述頗符合從小城鎮家規嚴格的大家庭初入京師者的防範心理，此時的京城對於秋瑾還是一個滿佈危險的陌生環境。不過，秋瑾很快就從最初的拒斥轉為興奮的投入，而與吳芝瑛的交往，則是其破關而出的機緣。

吳芝瑛的丈夫廉泉與王子芳為同事，且秋瑾居京期間，曾借寓吳宅，秋住丞相胡同（又名繩匠胡同，南端接南橫街），吳家北半截胡同，「相距咫尺」，故可以「無日不相見」<sup>③</sup>。由於吳芝瑛的關係，秋瑾得以結交眾多新派人物，並獲讀各種新書刊。此中，與一九〇二年剛剛恢復的京師大學堂的聯繫尤其值得注意。

當年，被任命為總教習的吳汝綸訪日，得知東京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將攜夫人到北京，出任京師大學堂外籍教習，特介紹其侄女吳芝瑛與服部夫人繁子相識。秋瑾亦得以與服部繁子交往，並常至其家中交談<sup>④</sup>。秋還曾應繁子之請，寫出〈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一篇長詩。她當時有意留學，正熱心學習日語與英語。其日文教師中也包括一九〇四年二月來京師大學堂任教的鈴木信太郎，〈秋瑾集〉中有〈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sup>⑤</sup>一首，即為其人而作。而江紹銓（亢虎）也與鈴木同時受聘為京師大學堂東文教習，秋瑾亦與之往還<sup>⑥</sup>。此外，其時在京師大學堂任編書局總纂的李希聖、仕學館學生歐陽弁元（旭德），

② 徐珂：〈秋瑾賦詩乞書〉，《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

③ 〈致琴文信〉（1903年5月5日）云：「瑾在京假寓繩匠胡同吳宅內，每月租金八兩。」（《秋瑾史跡》〔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吳芝瑛：〈致徐自華書〉，見王士倫：《秋瑾出生年代》引錄《歷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④ 見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日文原刊《東西交涉》第3號（1982年9月）；高岩譯，金中校的中譯文收入郭延禮編：《秋瑾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⑤ 中村忠行：〈秋瑾雜俎〉，《秋瑾研究資料》；又，鈴木任職時間依據《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1917年）中〈職教員名單〉所著錄。

⑥ 秋瑾：〈致秋譽章書〉其一（約1905年4月）言及：「江亢虎處無非使其指點而已，吹噓恐不能，但彼能為力之處必盡力，因彼為維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也。」（《秋瑾集》）此為秋瑾1905年春歸國省親初抵上海所寫，證明她與仍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江紹銓早有交誼。

也同秋瑾熟識<sup>⑦</sup>。

京師大學堂雖為清廷所辦的最高學府，卻畢竟是戊戌新政的產物，以取法西方大學教育為主導傾向。加之，「清季戊戌政變、庚子拳變，雖皆以失敗而告終。然在青壯年學生知識分子中，則自由、民主、革命及嚮往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萌發」，京師大學堂也不例外。一九〇二年入學的師範館學生王道元曾回憶當時學堂情形：「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及《新民叢報》，幾乎人手一篇，成為普通的讀物。」<sup>⑧</sup>因而，秋瑾也有機會在友人家中讀到梁啓超的著作，並將閱讀感想興奮地寫信告訴其妹：

任公主編《新民叢報》，一反以往腐儒之氣。〔……〕此間女胞，無不以一讀為快，蓋為吾女界楷模也。<sup>⑨</sup>

其中，梁啓超所作《（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無疑給秋瑾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後秋瑾在《精衛石·序》中，亦嘗號召中國女子繼承羅蘭夫人的精神，而其本人也確以羅蘭夫人為楷模，為救國走上了斷頭台<sup>⑩</sup>。

更值得一表的是京城最早出現的婦女團體——中國婦女啓明社，也與京師大學堂及服部繁子相關。參與其間，對秋瑾最終選擇留學日本具有決定性影響。

服部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中曾提及，一九〇四年正月的一天，歐陽弁元的夫人訪問她，講到已和吳芝瑛商定，為了「我們婦女可以常常聚會開展討論，交流學問」，「想舉辦婦女座談會」，邀請服部夫人指導。正月中旬，在西城某會館召開了婦女座談會開幕典禮，肅親王的姐姐、日本公使夫人等都應邀出席。二月，在歐陽夫人家舉行的座談會上，秋瑾也來參加，要求入會。這是她第一次與服部夫人

⑦ 陶在東〈秋瑾遺聞〉記：「時方議廢科學、興學堂，新政具舉，議論甚盛，湘人戶部郎中李希聖，以著《光緒會稽錄》著名者也；劉少少，主帝國日報社論，女士嘗從之遊，多所論列，是為由文學入政事之始。」（《大風》第15期〔1938年7月〕）歐陽弁元與秋瑾的關係見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但該文記歐陽弁元的身份為「大學堂副教授」，不確，歐陽實為仕學館學生，1903年《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中，署名者即有「仕學生」歐陽弁元（《大公報》1903年5月7日）。

⑧ 王道元：〈早期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史料》第4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

⑨ 〈致秋瑾書〉，轉引自沈祖安：〈拚把頭顱換凱歌〉，《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2合期。

⑩ 參閱筆者：〈羅蘭夫人在中國〉，《學人》第13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

會面。

由於服部繁子的文章寫於事隔多年以後，關於座談會名稱記憶不確，也是情理中事。而翻查當年的《大公報》，則可大體考知其經過。先是歐陽弁元利用一九〇三年大學堂放暑假，遊歷日本，歸來即立意創辦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學校。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設於西城翠花街的學校開學，管學大臣張百熙及京師大學堂各教習、總辦、提調等，以及仕學、師範兩館學生均出席典禮，以助聲勢<sup>⑪</sup>。兩個多月後，《大公報》又刊出如下報導：

西城私立小學校校長歐陽君之夫人，擬創辦一中國婦女啓明社，其大旨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為目的。定於明正舉行初次會議。<sup>⑫</sup>

而舊曆的正月初一是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六日，此社極可能是在二月二十日左右開辦（說詳下）。發起人為歐陽弁元的夫人，也與服部夫人的回憶一致。而根據〈中國婦女啓明社開辦簡章〉的「發起人」署名，可以知道歐陽夫人的本名為錫貞<sup>⑬</sup>。

中國婦女啓明社創立的本意，並非為限於知交間的小型座談會，而有更宏大的志向。在〈開辦簡章〉的「宗旨」一條，對此有說明：「本社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為目的，先在北京創立，以後再於各行省漸次推廣，添設分社。」社址便暫設在西四牌樓北邊的翠花街西城私立高等小學校內。其「職員及名譽員、顧問員」一章規定：

本社議舉正副社長二人，以華族婦女有學問者任之。任事員□人，以投票得多數者充之。並另延東西各國華族婦女有學術名望、旅居我國者為名譽員，各分期演說普通女學。又請顧問四員，不論中外，但求學術名譽，隨時臨社考察，以期完善。

服部繁子既然被歐陽夫人、吳芝瑛等尊稱為「師母」，成為主講，其身份應該是名譽員。

該簡章擬訂的辦法有十條，議定「每月聚會□次，以星期六為會期」，「十二點到會，四點鐘散會」；「本社中人，執事者可以執書演說，餘者從旁靜聽」。為

⑪ 見〈大學近聞〉、〈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學校招收學生廣告〉及〈西城私立高等小學校開校記〉，《大公報》1903年10月16日、10月2日、11月22日。

⑫ 〈昌明女學〉，《大公報》1904年2月10日。

⑬ 〈中國婦女啓明社開辦簡章〉刊於1904年3月11日的《大公報》，文末「發起人」署「渤海龍田之子錫貞」，應即是歐陽弁元夫人之名。

體現「互換知識」的學術組織新風尚，簡章對革除陋俗亦頗用心，如「會所僅備清茶，不供膳點」，「服飾不可過華，務尚樸素」，蠲除車班費，「依我國古禮，無長幼，均以執手為禮，請安、斂衽諸繁文概從刪節」，「於外來女客，無論在社與否，來去概不迎送」，都明文列出。出於擴大社務的考慮，章程也要求社員：「其相識之婦女，務乞相約偕來，不論滿漢長幼，皆可入會。」秋瑾第一次加入的婦女社團，規模雖未達到預期的目標，但其組織形式與精神，無疑為她留學日本後組建「實行共愛會」提供了啓示。

從如飢似渴吸取的新知識中，秋瑾很快確立了男女平權觀念。其在家庭關係上的表現，即是對丈夫王子芳原有的不滿進一步公開化。對秋瑾而言，反抗男權與夫權已不只是思想，更變為行動。在與王子芳的衝突中，秋瑾甚至採取了在當時女性中極為少見的離家出走這一激烈方式<sup>⑭</sup>。而留下一對小兒女、東渡留學的義無反顧，更顯示出秋瑾對自主獨立的熱切嚮往。在擺脫丈夫羈絆的同時，她也打破了家庭的範圍，恰如密友吳芝瑛準確記述的秋瑾自白：

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sup>⑮</sup>

雖然在秋瑾被殺後，為其抱不平的國內報刊多辯言，秋瑾之革命論乃「男女革命」而非「種族革命」，但在北京時期，其所追求的革命，確實未必越出「家庭革命」、「男女平權」之外。這從此時她對女學的熱心、專注可清楚看出。

一九〇三年，京城已有清廷正在考慮興女學的傳言，內務府大臣誠璋並曾委託服部宇之吉起草計劃。而中國婦女啓明社之學，在提議者錫貞、吳芝瑛等人，也有作為女學堂的預備與補助的用意<sup>⑯</sup>。但此議在朝廷內部顯然遇到了強大阻力，於是，一九〇四年一月清政府正式公布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sup>⑰</sup>，在女學問題上便仍持頑固態度，認定：「中國此時情形，若設女學，其間流弊甚多，斷不相宜。」因而，除少數已婚婦女可在各地官辦的蒙養院接受簡單的保育培

<sup>⑭</sup> 秋瑾：〈致秋萊子信〉，1905年9月12日言及「妹出居泰順棧」事，徐自華：《爐邊瑣憶》（上海：建設出版社，1943年）更進而補敘「王央請廉泉之妻吳芝瑛將她接到廉家新宅紗帽胡同暫住」的後事。

<sup>⑮</sup> 〈紀秋女士遺事〉，《時報》1907年7月25日。

<sup>⑯</sup> 見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

<sup>⑰</sup> 《奏定學堂章程》（學校司排印局，1904年）。

訓（每堂限定三十人以內），普通女子教育仍被嚴格限制在家庭範圍，並特別強調，絕不允許少年女子「結隊入學，遊行街市」。不過，此章程既然指出，「使全國女子無學，則母教必不能善」，「蒙養通乎聖功，實為國民教育之第一基址」，而其所允許的受學方式，又無法承擔起提供普遍良好的母教這一重大責任。有鑑於此，民間辦學的潮流因而並未嚴重受挫，在該章程公布後，反而可以彌補官方教育之缺失的正當理由，試辦女學堂。即在京師重地，民辦女學堂亦陸續創立。其中於一九〇七年以前開辦而與秋瑾及其交遊圈有關聯者，已不在少數。

就在《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頒布後一個月，一九〇四年二月一日的《大公報》便刊出一條〈創設女學〉的報導：

杜若洲農部擬在南城創設女學堂一區，學生往來備車接送。延浙江秋女士為教習，已擇繩匠胡同某宅為講堂，明正即行開辦。北京女學此為權輿，不禁拭目望之。

杜若洲本名杜德輿，與夫人、女兒均熱心女學。他曾力邀呂碧城來京，以壯大北京女學界的聲勢<sup>⑮</sup>。其夫人黃銘訓與二女兒杜成淑又一起創辦了中國婦女會<sup>⑯</sup>。此校即設立於繩匠胡同杜宅，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開學。引人注目的是《大公報》在同一報導中，對於該校師資情況的說明：「教習為日本某教員之夫人。」<sup>⑰</sup>證明在最先出現的京師女學堂中，已活躍著日本女性的身影。與國人在上海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中國女學堂——得到了西方婦女的幫助路數不同，晚清京城的女校多半與日人有關。

被譽為「北京女校之嚆矢」<sup>⑱</sup>的豫教女學堂，則與服部宇之吉夫婦有密切關係。此校總經理人沈鈞，「因為京城裡，女學不興，立意要創辦一所女學堂，開通風氣」，從一九〇五年五月開始醞釀，得到「大學堂總教習服部先生，和服部夫

<sup>⑮</sup> 見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集·歐美漫遊錄》（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

<sup>⑯</sup> 〈中國婦人會南洋分會來函照登〉，《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期（1907年4月）云，「杜成淑女士，為杜若洲主政次女公子，係四川旅京女學堂學生」，「杜夫人率同成淑諸女士，自立中國婦女會，稟由警廳立案」。

<sup>⑰</sup>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4年3月25日。

<sup>⑱</sup> 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東京：博文館，1908年）；中譯本更名為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引文出第十五章〈清國教育制度及北京的官立、公立、私立學校〉。

人，幫同盡力，苦心經營商議，延請各位女教習」，終能在當年八月三十日開學上課<sup>②</sup>。服部宇之吉並出任經理人，「襄助學堂一切事務」；服部夫人則為女經理兼教員<sup>③</sup>。至一九〇七年初，該校已有學生近七十人<sup>④</sup>。服部夫人對興辦中國女子教育十分投入，除經管豫教女學堂外，也曾一度協助辦理淑範女學校教務。後者創立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三日，到一九〇六年十月，已有學生八十人<sup>⑤</sup>。

豫教、淑範之外，被服部宇之吉主編的《北京志》並舉為北京最知名的三所私立女校中，尚有江亢虎創建的女學傳習所。江氏亦為女子教育的力行人。一九〇八年春，他有事到密雲，也順便竭力鼓動知縣出面，以官力辦女學，並代為籌劃，終使女學堂得以在密雲縣署西花廳內開張。這在江亢虎尚屬「無心插柳」<sup>⑥</sup>。而其自任經理的三所女學傳習所，則是江氏傾注大量心血的傳世功業。一九〇五年創辦之初，女學傳習所只有內城一處，後逐漸擴大，又增加外城與中城兩所校址。三處校名也均由女界名流題寫，外城的書寫者為吳芝瑛，內城是呂碧城。「江亢虎君一個人辦理三個女學傳習所」<sup>⑦</sup>，也成為京城教育界的佳話。一九〇七年一月，秋瑾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女報》第一期上，便有〈北京外城女學傳習所詳記〉一文，介紹該校「開辦以來，教課完善，遠近聞風，報名絡繹不絕」，學生人數，已達一五〇名，且有自天津、保定等外地前來就學者。《中國女報》的寄售處，北京地區也注明由「順直門外繩匠胡同外城女學傳習所江亢虎君」辦理。

此外，秋瑾去國前專程前往拜訪的呂碧城，為一九〇四年在天津成立的女子公學總教習；給《大公報》主人英斂之寫信引見秋瑾、並伴其返回京城的傅增湘，則是這個天津第一所官辦女學堂的監督，傅氏還兼任北洋高等女學堂與北洋女師範學

② 〈豫教女學堂慶員萬壽並周年紀念會演說〉，《順天時報》1906年11月27日，錄自《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年），下冊。以下，凡引《順天時報》者，均出此。

③ 〈北京豫教女學堂章程〉，《東方雜誌》2年12期（1906年1月）。

④ 〈記北京豫教女學堂教育進步〉，《順天時報》1907年2月20日。

⑤ 見《清末北京志資料》，第十五章。

⑥ 〈密雲縣署女學成立志喜〉，《順天時報》1908年5月22日—23日。

⑦ 見〈女學紀念展覽會詳記〉、〈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順天時報》1909年9月31日—10月1日、9月3日—7日。

堂（均於一九〇六年設立）兩校監督（總理）<sup>28</sup>。

既然秋瑾居京時期交往的朋友中有如許多的女子教育熱心人，受此氛圍感染，她也將推行女學作為女性爭取獨立地位最重要的手段。吳芝瑛所述秋瑾有關「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的一段話，可為佐證。因吳氏覺其以「家庭革命」求「男女平權」之言過於激烈，「時時戒之」，秋瑾卻答道：「姊勿怪，吾所持宗旨如此。異日女學大興，必能達吾目的，其在數十年後乎？然不有倡之，誰與賡續也？」秋瑾於是一力擔當起提倡女學以謀求平權的責任。即使留學後，其思想已有極大發展，而對女子教育的關注仍始終如一。犧牲前半年發刊的《中國女報》，也明確地在創辦宗旨中列出「提倡女學」、「志在擴充普及女界之智識」<sup>29</sup>的內容，雖然對此時的秋瑾而言，這已是婦女解放的最低要求。

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主動與吳芝瑛結拜為姐妹的秋瑾，顯然以吳為其留京期間最知己的摯友。吳氏的記述對理解此期秋瑾的思想，自是最可靠的證言。秋瑾遇難後數日，吳芝瑛曾滿懷悲憤，寫出〈秋女士傳〉<sup>30</sup>一文，概述秋瑾的生平，痛斥官吏的殘暴。而敘其北京生活一段，文字如下：

女士居京師有年，痛憤庚子之變，以提倡女學為己任。凡新書新報，靡不披覽。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漸深。

以下所記「脫簪珥為學費」、「子身走東瀛留學」，既因受刺激而起，又與「提倡女學」直接相關。從杜德輿延聘秋瑾出任女學堂教席一事的反覆，可見秋瑾此時的真實想法。

秋瑾對女子教育原抱有極高熱情，一九〇三年清廷有意開放女學堂的傳聞，曾經使其大為興奮。當年五月五日，她給不久前在上海結識的琴文伯母寫信，便議及：「京都有興女學之言，未知章程如何，尚未見明文也。」<sup>31</sup>正因對辦女學如此關注，秋瑾才會應邀出任繩匠胡同杜宅女校的教職。而前述《大公報》上的記事，

<sup>28</sup> 見〈英敏之先生日記遺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記天津學界總調查〉，《順天時報》1909年11月20日與〈北洋女師範學堂開校紀盛〉，《直隸教育雜誌》2年9期（1906年6月）。

<sup>29</sup> 〈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中國女報》2年1號（1907年3月）。

<sup>30</sup> 《時報》1907年7月21日。

<sup>31</sup> 〈致琴文信〉，《秋瑾史跡》。原信署「四月初九日」，無年份。查〈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頒布於1904年1月，此函應為1903年所寫。



自是以秋瑾本人的承諾為依據。但僅僅一月後，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該報又發出另一則內容更改的消息：

浙西秋濬（璿）卿女士，好學極篤。去冬有訂其為女學教習者，女士以未經身親文明教育，未敢冒昧從事。故極意遊東瀛，以覘學務。乃適值日俄事起，海道阻梗，而女士之志不以此少餒。現與大學堂教習服部君之夫人相訂偕行，俟有東渡之船，即行東裝。壯矣哉！鬚眉男子所不及焉。<sup>⑳</sup>

參照服部繁子所記秋瑾參加婦女座談會因而與其相識的經過，則中國婦女啓明社在舊曆新年後不久，即二月二十日左右，便應舉行過成立典禮，秋瑾也必定很快加入該社。因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刊載得自北京的消息，最少也要遲兩天。起初答應杜德輿任教之時（一月底以前），秋瑾尚未見過服部夫人。而一旦會面，有服部繁子代為向東京實踐女學校校長下田歌子推荐，並結伴上路，留學日本已成為切實可行的計劃<sup>㉑</sup>，求新好奇的秋瑾自然會改變初衷。不過，此行仍以研究日本女子教育、為中國女學取法為主旨，遊學的目的正是為了取得辦好女學堂的合格資格，這在上述通訊中已交待得十分清楚。

秋瑾東行前一日<sup>㉒</sup>，吳芝瑛曾給在日本的朋友寫信，引見秋瑾，托其介紹於下田歌子，並「為秋女士照料一切，至要至要」。此信因只見縮小之影印件，有些字辨認不清，但大意可知。吳在信中言及：

茲有秋璿卿女士，自備資斧，來東留學。女士與（予）結為兄弟，在京晨夕過從，親若同胞。今痛（吾國）女學之不振，在京創設學會，大聲疾呼，欲以一身挽回數千年之積習，使吾國二萬萬女子脫此沈痛，以達其自由之目的。<sup>㉓</sup>

從信中所言，可知秋瑾確為中國婦女啓明社的重要成員，而非如服部繁子所說，「不大出席座談會」。此函也進一步證實了，直到去國前夕，吳芝瑛從秋瑾那裡得到的留學說法，仍是以振興中國女子教育為鵠的。

<sup>㉑</sup> 〈女士壯志〉，《大公報》1904年3月1日。

<sup>㉒</sup> 見服部繁子：〈回憶秋瑾女士〉。

<sup>㉓</sup> 據《大公報》1904年6月23日〈車站紀事〉：「北京大學堂教習日員服部氏之夫人，於昨早由京乘火車至塘沽，換輪回國。」而吳芝瑛的信函落款時間為「五月初八日燈下」，即陽曆6月21日晚。

<sup>㉔</sup> 〈祭女烈士秋瑾文〉上端之影印件，惠毓明編：《吳芝瑛傳》（無錫：雙飛閣，1936年）。括號內為代擬字。

儘管到達日本以後，秋瑾很快接受革命思潮，轉向尋求民族解放，言行日趨激烈；但考察其在北京時期的思想，根據現有的可靠材料，我們只能得出如下結論：秋瑾的認識已達到爭取婦女解放的高度，其實行手段即是推廣女學，以獲取女性自立的能力。如此描述，並非貶低其覺悟程度，而恰恰是肯定秋瑾的思想確實與時代同步。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於東京彌生寓所